

简述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摘要：简述了语言与文化的相辅相成，但又不能合二为一的相互依赖的关系。论述了在语言学习的过程中，了解相关的文化背景，对于更深入地掌握语言的技能具有事半功倍的效果。分析了不同语言之间的文化差异及造成这种文化差异的根源和表现形式。指出如果不能充分了解文化背景将导致语言表达意义上的背道而驰；不仅是语言具有相对性，其文化背景也同样具有相对性，只有把语言学习与文化知识的补充紧密地结合起来，才会使外语学习变成一种乐趣，而不是简单刻板地死记硬背单词和语法。

关键词：符号系统；社会系统；语言相对性；文化相对性

Abstract : A language is just relatively independent of the corresponding culture. So , understanding the related cultural background is indispensable to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process , by which one can comprehend the essence of the language more efficiently. Based on a discussion on the cultural discrepancy between different languages and the causes and representations of the discrepancy , it is found that an incorrect even reverse meaning or expression will be possible in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process because of lack of full understanding of cultural background. It is revealed that there are not only the linguistic but cultural relativity. It is of importance to combine closely the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with knowing the culture of that foreign country as a supplement . If so , the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can make one exciting and fruitful without a tiresome feeling due to memorizing mechanically words/ grammatical rules.

Key words : symbol system; social system; language relativity ; culture relativity

语言是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其社会功能广博巨大、难以估量。大千世界纷繁多彩的传统文化与生活方式，各种特定的思维模式，均依赖于语言得以成形、积累、发展和传承。而文化对于语言的形式亦不断产生深远影响，远非“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所能概括的。如果我们能够熟谙母语与目的语、本民族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的共性与差异，便能在不同的语境中得心应手地开展交际活动，进入一个语言的自由王国。

一、文化的社会性与语言的社会性

众所周知，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也是一种社会现象。中国近代的女性服装“旗袍”（cheongsam），在变革动荡的20世纪50年代，频频出现于报刊杂志的“大跃进”（a great leap forward），以及曾经肆虐一时的SARS（非典型肺炎的英文缩写）等都充分反映了一个时期的文化或者社会特征。语言的这种“社会性”说明，语言系统不可能是一种存在于真空中独立发展、自生自灭的系统，人们的言语表现形式不时受存在于语言之外的社会要素的制约。

1. 语言系统是社会系统中的一部分语言和社会文化紧密地交织在一起。语言是整个社会文化的产物或结果，又是形成并沟通文化其他成分的媒介。换言之，语言系统内部诸要素无一不与社会大系统的诸要素发生联系，而且这种联系不是简单的对应，而是纵横交错，此渗彼透，全方位的联系[1]。例如，三角债（chain debts）反映了在中国企业经营过程中所出现的一种特殊的财务关系；“售出商品，质量低劣，保证退款”（Goods are sold with money back guarantee），则说明在市场经济还不成熟的商业环境下，我国的销售企业处于从计划经济逐步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阶段。由此可见，只有把语言系统放在社会大系统中加以考察，才能更有效地揭示语言的本质以及语言系统的内在规律。因此，把语言与文化结合起来，进行深入的比照性研究，能够更加广泛地揭示语言的“社会性”，同时也能加深人们对语言的文化功能的理解。

2. 社会系统依赖语言系统而存在由于“任何语言都是习得的行为方式的复杂体”[1]，因此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但是不能说文化就是语言，文化不等于语言，而应是文化大于语言。镰刀作为一件纯粹的农业工具并不说话，可是把镰刀和斧头画到旗帜上，就变成一种无声的语言，宣告工农的联合，表现劳动大众的革命力量。其实从符号学角度看，语言以外的符号，如莫尔斯点电码、聋哑人的手势、海陆交通信号等也能表达某种意义，不过人类的经验和行为主要是由语言符号的意义来体现。换言之，文化大系统不可能独立存在于语言系统之外，反之亦然。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颇似形式与内容的相互作用，但又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形式与内容之间的相互作用[2]。中国人用“红色”象征无产阶级革命，但西方人却从

斗牛的文化中深感“红色”为不祥之兆。在中国，一旦有人官运亨通，人们会用“红得发紫”来形容他，而周围眼“红”者大有人在，但英美人却用“green with envy”来形容别人对这位“a fair2hairedgirl”（红人）的妒忌之心（“a red2haired girl”会被英美人误认为是“红头发的女孩”）。由此可见，一方面，语言系统本身是构成文化大系统的要素之一；另一方面，文化大系统的其他要素都必须由语言来传达，从而不断发展变化。换言之，我们可以观察到作为文化的一部分的语言和作为文化传播媒介的语言这种双重性质。这种双重性质确定了语言与文化的不可分割性，正如法国著名符号学家罗兰·巴特所言：“无论从哪方面看，文化都离不开语言”[2]。

二、文化的民族性与语言的民族性

1. 民族个性决定了语言差异语言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又是文化的镜像折射。透过一个民族的语言层面，窥见的乃是这个民族的绚丽多姿的文化形态。由于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亦即文化个性，不同的文化自然会呈现不同的文化形态。这种文化形态的差异反映到语言层面上，则表现为语言差异。汉民族有含蓄委婉，避免直白本意的表达方式，而西方人则善于恭维他人，也善于接受他人的恭维。我们经常会听到中国学生与外国教师谈话之前总要先说一句“Ispeak very bad English”，或者“My English is very poor”。相反地，他们的外国教师却认为“Youspeak very good English”。正因如此，任何跨文化的研究，如比较文学、翻译、外语教学等，都不能只从本国文化的接受心理去考察语言差异，而应兼顾文化差异。从文化差异出发去研究语言差异，才能有效地把握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

2. 词汇差异是语言差异的最直接体现词汇是语言的基本构素，是语言大系统赖以生存的支柱，因此文化差异在词汇层次上体现得最为突出，涉及的面亦最为广泛[3]。汉民族严格区分亲属关系源于汉民族的封建主义文化。封建主义文化非常重视亲属特征，无论哪一方面的社会交际，都须按亲属称谓的规定；无论是丧礼，婚礼，承继遗产，以至一人犯罪，株连九族，均要按亲属系树的等级办理。这种严格的区分导致了汉语亲属称谓的复杂化，而西方人趋向于跨越年龄界限的平等。他们认为，能力、知识及权威才是衡量人的重要标志，年龄大小并不能说明什么。汉语中父辈方面的名称有叔父、伯父、姑父、姨父、舅父等，这些称谓复杂到小孩们往往混淆不清的地步。而英国人就没有这么麻烦，一律以uncle统之。由于uncle一词只在家族内部使用，因此没有必要与姓氏连用，与之连用的是名。如Tom King在家族中可称作Uncle Tom，外人却不能以Uncle相称。若以头衔相称，则要与姓连用，如Mr. King, Dr. King等。英美人还有一个习俗，在非正式场合，希望对方以名字相称，甚至小孩对长辈也是如此。中国人认为这是失礼的，而西方人则感到随和、亲切。

三、文化对等与语言对应 我们知道，不同民族的语言之间总是存在着词汇对应关系，这是双语词典的编纂基础，是跨文化交流的基本条件[4]。但“对应”不等于“对等”。即使表达的理性概念(rational concept)相同，往往会因文化不同而产生不同的联想意义(associativemeaning)。如在汉语中，人们认为“老师，您好”体现了学生及社会对教师这个职业的尊重。但是，在英国，人们则认为这种“Hello, teacher”的说法过于呆板，甚至令人反感。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生态环境下建立了自己的文化体系。表达同一理性概念的词，由于在不同的文化氛围下不断使用，获得了附加在理性意义之上的不同的联想意义，因而会引起不同的心理反应。英语中的“gay”本意为“cheerful, merry, happy”（快乐的）。但在今日谈艾滋病色变的美国，“gay”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同性恋”，这种联想在不谙美国文化的中国人的心目中就很难引起共鸣。由此看来，受文化背景制约，通过联想产生的超语言信息差别，或曰文化信息差别，是无法通过词汇对应来弥合的。正因如此，在跨文化的言语交际中，不了解语言这种“文化信息”，有效交际势必受阻。如在外籍教师休息室门口上写上醒目的“Restroom for Foreign Teachers”，以示照顾，殊不知restroom乃盥洗间之别称，以致使外籍专家啼笑皆非。这是在词面意义对等和文化对应之间随意划等号的结果。

四、文化的相对性与语言的相对性

1. 深厚的文化背景决定了文化的相对性在跨文化的言语交际中，灵犀不能相通的根本原因之一是文化差异导致了接受心理差异，成了“相通”的障碍。正如萨培尔和沃尔夫提出的“语言相对性”(Linguistic relativity)，同样人类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也存在着“文化相对性”(Cultural relativity)，且“语言相对性”与“文化相对性”相互依存，交互作用，在形成一个民族

特有的思维习惯和语言模式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外国友人到中国人家里做客，见到男主人的妻子时，说一句“Your wife is really beautiful”之类的恭维话，在西方文化类似的语境里是司空见惯的，但汉民族文化显然难以接受这样率直的恭维方式。同理，中国人在街上碰到熟人，说句“你到哪儿去(Where are you going)”，是寒暄的套语，无可厚非，即使问长问短，叙谈几分钟，也并不少见。但是对于西方人来说，这种探隐问私的方式往往会招来误解，甚至引起他们的反感。

2. 形似绝非语言表达的最终境界

由此可见，模仿印欧语言句子模式的“欧化”语言，和汉民族根深蒂固的文化接受心理是背道而驰的；同理，以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创造的“中国式英语”，和英美长期形成的文化接受心理也是格格不入的。在使用一种语符转换成另一种语符时，单纯追求形似，就难免削足适履，破坏各自语符系统独有的神韵，得不偿失[5]。在向外商推销国产“白象”牌电池时，广告中大肆宣传“whiteelephant”性能，却不知“white elephant”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可能意味着“笨拙”，从而适得其反；相反，如果简单地把莎士比亚的名句“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 day”中的“summer's day”译为“骄阳似火的夏日”，则破坏了原意的令人惬意、甚似“小阳春”的美好意境。

五、结束语

语言作为一种符号系统，其媒介和它所承载的信息形影不离。因此，我们事实上不能把语符系统和文化系统断然分离开。萨培尔说：“言语具有一种非本能的，获得的‘文化的’功能。”对于初学语言的人来说，在习得母语系统的同时，也不自觉地习得本国的文化系统；在内化(internalize)语言系统内部组织规则的同时，也会内化文化系统中的规范。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外语教学中冲破传统的工具主义语言观的樊篱，树立崭新的文化语言观，是必要且有效的。当今国与国之间的科技交流频繁，文化交流日盛，文化习得意识将促进语言技能的培养，使学生在有意识的语言习得中习得必备的文化规范，即“语言能力”(linguistic competence)和“文化能力”(cultural competence)兼备。惟此能真正发挥语言表达思想、交流情感之功能。

参考文献：

- [1] 陈原. 社会语言学[M]. 北京:学林出版社, 1993. 72, 76.
- [2] 司马云杰. 文化社会学[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8. 115.
- [3] 叶蜚声. 语言学纲要[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61- 63.
- [4] 池上嘉彦. 符号学入门[M]. 张晓云, 译.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5. 22, 60.
- [5] 胡文仲. 文化差异与外语教学[J].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82, (4): 2 - 4